

中国城市发展报告

(2002 ~ 2003)

中国市长协会
《中国城市发展报告》编辑委员会



商務印書館

中国城市发展报告

(2002~2003)

中国市长协会
《中国城市发展报告》编辑委员会

(本报告中所阐述的观点系学者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见解)

商务印书馆

2004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02~2003)/中国市长协会《中国城市发展报告》编辑委员会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4

ISBN 7-100-04107-4

I. 2… II. 中… III. 城市经济—经济发展—研究报告—中国—2002~2003 IV. F29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 第 007707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中国城市发展报告

(2002~2003)

中国市长协会

《中国城市发展报告》编辑委员会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河北三河市艺苑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4107-4/F·486

2004年2月第1版 开本 889 × 1194 1/16

2004年2月第1次印刷 印张 421/2

定价: 198.00 元

《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总顾问

成思危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路甬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罗豪才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徐匡迪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周光召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原副委员长

《中国城市发展报告》顾问

汪光焘 建设部部长
王梦奎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刘燕华 科技部副部长
曲格平 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原主任
刘 江 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原副主任
周干峙 建设部原副部长、两院院士
赵宝江 中国市长协会副会长
李振东 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中国城市发展报告》理事会

理 事 长 蒋正华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副理事长 陶斯亮 中国市长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理 事 蒋正华 陶斯亮 廖幼鸣 崔衡德 王长远
汪晓来 薛 澜 叶文虎 牛文元 李丽俭

《中国城市发展报告》学术委员会

主 任 吴良镛 清华大学教授、两院院士

《中国城市发展报告》编辑委员会

主任委员 蒋正华(兼)
委 员 牛文元(执行) 叶文虎 李丽俭

《中国城市发展报告》工作委员会

主任委员 王长远(兼)
委 员 初维民 于晓明 宗再芄

《中国城市发展报告》首席科学家

牛文元 中国科学院教授、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国务院参事

《中国城市发展报告》专家组成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于景元 马 中 井文涌 巴德年 牛文元 王一鸣 王玉民
王如松 王国强 厉以宁 叶文虎 叶耀先 白和金 石元春
石玉林 朱铁臻 许学强 何祚庥 吴启迪 吴良镛 吴敬琏
张坤民 张象枢 李成勋 李京文 陈述彭 陈宗兴 杨开忠
周一星 金 碚 赵景柱 钱 易 顾朝林 黄宁生 薛 澜

《中国城市发展报告》境外专家组成员

杨汝万 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所长

郑宇硕 香港城市大学讲座教授 宋雅杰 美国耶鲁大学研究员

W. M. Harris 美国密西西比大学城市学院院长、教授

《中国城市发展报告》研究与执笔组

组长兼主编 牛文元

执笔组成员 陈 锐 康大臣 秦明周 毛志峰 袁宝印 岳天祥
王 徽 高 菁 柳一路 曲奔驰 李嘉菲 薄初节
高络华 蔡灵地 高小静 贺铁林 朱良平 钱达明
肖劲松 郑 洋 王 颖 朱高洪 杜婷婷 于 森
金丽佳 黄和宁 张鸿儒 李丽俭 边孝寅 任斯辉
刘学红 杨依梦 刘京莉 高亦婧 王自晴 曹山岭
于秋明 蔡宗皇 王玉珏 卢基敏 赵牒之 陈惠庆

《中国城市发展报告》统稿组

牛文元 陈 锐 康大臣

《中国城市发展报告》编辑部

主 任 李丽俭
编 务 郑爱丽

数据分析 肖梅婷
数据计算 刘雅苹

序 一

《中国城市发展报告》理事长 蒋 正 华

城市化是现代化突出的特征之一,我国三分之二以上的 GDP 和税收来自城市,90%以上的科研力量集中在城市,振兴经济必须推进城镇化。中国人口多,土地少,资源相对缺乏,必须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人类历史上战争的需要产生了城,交易的需要产生了市。很长的时期内,城堡是军事要塞。古代欧洲人认为,最佳的城堡人口规模是 5000 人,这一规模就是根据当时作战的军事力量、后勤供给等因素综合估算的。在 18 世纪之前,城市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 3%左右,城市是政治、文化、消费的中心,而不是生产的中心。农村养活了城市,农村支持着城市,城市发展受到农村生产力增长的约束。

工业革命改变了城乡关系。生产方式、工具和资源的改变,使城市潜在的能力充分发挥。城市聚集财富,形成生产中心,规模不断扩大。按国际上较严格的城市人口估计数字判断,1800 年,全球只有北京人口超过 100 万,达到 50 万人以上的城市也只有 6 个。1900 年,超过 100 万人口的城市增加到 16 个,伦敦的人口则超过了 500 万。1950 年,全球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 30%,到 2000 年,这一比例提高到 47%,其增长率不断提高。从目前发展趋势看,世界城市化势头依然强劲,城市已经成为金融、经济发展的“火车头”。预计 21 世纪中,世界人口将有 65%左右居住在城镇,城市发展的速度及其模式,将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中国古代曾经出现过世界最大的城市长安、北京、杭州、南京等,反映了当时中国综合国力的强大。由于近代受到帝国主义者的侵略,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远远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 11%,仅及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20 世纪 50 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城市人口比例迅速提高,10 年间增加近 9 个百分点。然而,60 年代到 70 年代的 20 年间,市镇人口比例反而下降了 0.3 个百分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在城镇化过程中反映得十分明显。80 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城市化水平也随之迅速提高。改革开放以来,市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由 17.9%提高到 36.1%,翻了一番。经济社会的发展使许多落后贫穷的地区变成了高度现代化的新城镇,大都会,大、中、小城市和广大富有活力的城镇,带动了

各地区经济社会蒸蒸日上、不断发展,形成了良性循环。总结城市化发展的经验,确定进一步推动城镇化,进而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更上一个新台阶的战略措施,是在当前这个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重要任务。

世界和我国的城市化在主要的发展阶段方面有着共同之处,由于我国人口多、土地少、资源相对缺乏的基本国情,我国的城市化又有着鲜明的特点。工业化和现代化是各国城市化发展的推动力,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城市的结构有着明显的差别,大体上可分四个阶段。发展初期首先在一些孤立的点上形成了城市,这些城市大体上有两大类型,即供给型与需求型。供给型城市具有交通、通讯、服务、基础设施、政策环境、金融体系、人才与劳力、管理机制等方面的良好条件,使经营者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其价值,因而迅速发展成为经济中心;而需求型城市由于有特殊的资源,如矿产、能源等,为经济发展所必需,因而其他地区对该处有着不可替代的需求,也可以吸引投入,顺利地发展起来。城市化的第二阶段是孤立的城市之间由于溢出效应受到带动而发展起来,一般是沿着主要交通干线,形成城市带,国内外都可以看到许多这样的例子。城市带的发展往往是因中心城市地产高涨,生产成本提高,投资自然沿着最靠近中心城市的地区逐步扩散。城市带的发展推动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交通、通讯网络进一步完善,城市化也推进到第三阶段,即城市网群的形成。由多座大、中、小城市形成的城市区在产业、技术、运营等方面互相渗透,产生良好的互补关系,获得了大大超过单一城市的收益,在国家的经济生活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例如,美国大纽约区、五大湖区、大洛杉矶区三大城市区,其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美的67%;日本的三大城市区,即大东京区、阪神区、名古屋区,国内生产总值占日本全国的70%;其他经济发达国家也都有类似的情况。中国的城市化轨迹与世界相似,只是我国目前的三大城市区,珠三角区、长三角区与环渤海区,国内生产总值只占到全国的38%,说明其聚集和创造财富的作用还远未充分发挥,还应采取适当的政策加以推动。目前,世界经济发达地区的城市化正在向第四个阶段发展:将地域与功能组合起来形成复合式的城市集团方向发展,其推动力量来自三个方面:

1. 经济全球化发展迅猛,跨国公司规模不断扩大,要求在全球范围内重组资源,实现利益最大化。
2. 网络技术发展迅猛,电子业务应用不断拓展,虚拟空间中实现跨地域紧密合作成为可能,功能性的集成显得更加重要。
3. 科学技术发展迅猛,现代科技需要迅速掌握最新研究及应用的动态,要求整合各种资源,组织多领域、多地区专家联合攻关,虚拟实验室可使跨洲科学家共室携手研究、讨论。

城市集团的发展及其深刻的影响在今后数十年内将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我国在本世纪头 20 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在目标中引人注目地提出了“城镇人口的比重较大幅度提高,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的要求。并明确地指出:“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要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并明确提出了“发展小城镇要以现有的县城和有条件的建制镇为基础,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同发展乡镇企业和农村服务业结合起来”。十六大提出的这些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既符合城市化的一般规律,也切合中国的国情和现状。

我国地区发展很不平衡,城市化的水平相差很大,城市化的模式与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一样,有着不同的特点。大体而言,长三角区上海无疑是龙头。浙江的城市化是分散型,县级经济各有特色,强县林立。江苏、山东则形成板块型,有明显的强势城市区群。广东的城市带优势明确,正在形成大珠三角区群,外向型的特色鲜明。环渤海区则有首都与天津两大直辖市的带动,许多国际机构、国际性大企业在北京设立总部,其优势十分明显。上海与北京无疑将是我国两大国际性的中心,发挥带动全局的关键作用。东北和西部正在逐步形成和发展地区性的经济、社会中心,资源、人才优势开始显现,近年来多项国债项目正推动这些地区加快发展。

我国的城市化应当考虑到几点基本国情,采取相应的策略:

1. 长期的二元化经济结构造成了城乡的巨大差距,仅依靠传统意义上的农业不可能改变农村落后于城市的现状,必须采取超越世界一般城市发展阶段的特殊措施,根据经济发展规律,有计划地构造地域与功能相结合,特大城市、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一体化的城镇集团,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国际上许多特大城市发展到一定水平后产生反城市化现象(Counter-urbanization),受交通、供水、污染、民居、费用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特大城市规模缩小,功能减弱。通过集团化,我国可以发挥腹地广大的优势,实现大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大城市的辐射、带动、溢出效应,可以层层传递或直接连接到小城镇,加快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实现共同富裕。

2. 中国人口多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现实,直到本世纪中,始终存在相当多的富余劳动力。大部分富余劳动力以潜在的状态存在于农村,降低了农业的生产率。根据一些劳动经济学者的计算,越是经济落后的地区,富余劳动力的比例越高。目前全国富余劳动力可能高达 1.5 亿到 1.9 亿之间。因此,我国的城市化必须有利于促进劳动就业,有利于农民收入的提高,有利于农村经济上一个新的台阶。为此,需要制定一些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政策措施,如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放开劳力流动限制,促进观念、信

息、资源、人员等方面的交流,促进技术、产业、营销等方面的合作。

3. 我国经济发达地区面临着激烈的国际竞争,十六大提出这些地区要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不仅是国家发展的战略需要,也是这些地区把握机遇,积极应对挑战的需要。在经济发达国家已占领世界的情况下,我国必须实现跨越式的发展。为此,各级中心城市应当努力培养城市发展潜力,大力加强城市发展能力。城市发展潜力主要有经济实力、法制环境、资源条件、基础设施、管理体制、社会组织等方面的因素,城市发展能力则主要是创新能力、集成能力和科技能力,这些因素都应当就每个城市的特色深入加以分析,明确重点。

4. 抓住关键技术,迎头赶上,形成特色,协调配合,建立体系。21世纪初,网络技术、信息科学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受网络影响最大的产业部门是电子、电信、金融、零售、旅游。近年来,政府和企业上网采购,推动了电子商务发展。一些国家政府网上采购额达到本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0%,思科公司70%的客户订单来自互联网,我国近年来电子政务与电子商务也正在蓬勃发展,亟待协调规范:减少重复建设,增强综合效益;统一技术标准,实现全国互联;明确法制规范,保护公众权益;加强监管协调,确保国家安全。通过全国性的网络建设,推广各类应用,使城市的带动、辐射作用加强,加快达到城市化的高层次发展阶段。

5. 资源的外向型城市发展策略与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是许多国家存在的普遍现象,中国的特殊国情是人口密度稀少的地区从生态角度而言人口数量也已经超过了适度承载能力。尤其是这类地区许多位于大江大河源头,过度开发不仅使这些地区遭受灭顶之灾,生态环境受到毁灭性破坏,而且会祸及全国,影响后代。我国最稀缺的资源是淡水与土地,水源的涵养也需要土地的支持,经济发展更需要适量的用地,我国应当充分利用世界土地资源,增加经济发达地区土地开发的弹性,严格保护全国生态环境,确保实现可持续发展。全球可耕地总计约34亿公顷,已耕的约13亿公顷,在剩余的21亿公顷可耕地中,约10亿公顷可以容易地开发。因此,鼓励我国发达地区帮助培训贫困地区农民,争取与外国政府合作开发农田,允许相应地对发达地区土地实行弹性管理,科学规划、管理各类土地的使用,实现资源的替代效益。这样,发达地区的土地可以在经济发展中实现更大的价值,贫困地区的农民可以提高技术水平和适应能力,地区之间的联系可以更加紧密,生态环境可以得到有效的保护。

6. 重视城市化的负面效应,加强公共管理体制建设。城市化,特别是大城市的盲目扩张也带来了许多负面效应,如房价高昂、交通拥挤、环境污染、治安恶化、失业严重、供应困难等,被统称为“城市病”。城市病导致生产成本提高,居住条件恶化,富有者迁出城市,使城市税收减少,供给能

力削弱,形成恶性循环。企业迁出城市导致城市经济带动能力下降,失去中心地位,少数城市甚至陷入破产的绝境。许多经济发达国家百万以上人口的城市规模不断缩小,中等城市的作用正在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人口则不断向一两个特大城市集中,有的国家首都人口数占全国城市人口的70%以上。我国一方面需要加快城镇化过程以促进发展,调整结构,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城市中下岗职工增加,城市贫困人口生活困难,城市管理出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的动向,科学地规划城镇化发展,量力而行,未雨绸缪,早为之备。

本年度报告集中分析了城市的发展途径与城市发展的因素,各方面的专家各抒己见,希望能够对我国城镇化决策和实践尽绵薄之力,也希望增进世界对中国城镇化的认识,欢迎各界对报告提出的观点进行批评、讨论。

2003年10月7日

序 二

中国市长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陶斯亮

《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02~2003)》又与读者见面了,对市长协会来说,这是一件可贺可喜的事情,因为这不仅仅意味着众多科学家经过一年的辛勤耕耘,终于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时也意味着市长协会在为城市和市长服务上又做出了实实在在的一件事情。这是非常为我们所看重的。

市长协会是在中国市长们的千呼万唤下,经过八年的筹备,才于1991年成立起来的。当时有几百名市长参加了成立大会。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同志在接见市长们时说:“中国市长协会的成立是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所以说,市长协会一成立就接受了国家领导人的重托和很高的期望。

确实,中国市长协会并非哪个人凭空想出来的,它是中国改革开放进入高潮的必然产物,是世界全球化催生出的新生事物。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都有市长协会(或叫城市联盟),像美国、法国、意大利、俄罗斯、日本、加拿大、以色列、菲律宾,国家不分大小,不分穷富,但他们的市长协会都为本国的城市发展做出过卓越的贡献。例如美国市长协会,它成立于1929年,正是美国经济大萧条的时期,美国各地的市长们云集华盛顿,与总统罗斯福商讨对策,并自发地成立了美国市长协会,美国市长协会对罗斯福新经济政策的推动及二战后美国经济的复苏,起了无可估量的作用。

中国市长协会的成立,可以说是顺应了国际潮流,也促使中国的城市和市长们在相互沟通的同时,适时地融入了国际。中国市长协会成立后,本着考察世界城市,广交各国市长朋友,学习借鉴别国一切好的经验的初衷,12年来,与许多外国市长协会建立了合作关系,双方均派出了多个代表团互相访问。特别是中国市长协会,一共派出近50个市长团,共700多人次到国外学习考察,这件事的意义是深远的,所以李鹏总理说“中国市长协会的成立是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也就在于此了!

随着我国社会与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市长协会自身也要求尽量赶上时代。如果说前10年市长协会着重于为市长个体服务的话,那么现在就该轮到了全面贯彻协会两为方针即“为城市的发展服务、为市长工作服务”的时候了。

在2001年的第三届市长代表大会上,温家宝同志对协会的工作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他将协会在新时期的新任务高度概括为四句话“市长协会应成为联系城市的纽带、培训市长的基地、城市合作的桥梁、研究城市问题的论坛”。如何落实这四项任务,是市长协会当前的要务。

而《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正是适时适宜地向全国乃至全世界发布中国651个城市的最新动态,它不仅让关注中国城市问题的专家、学者、企业家、政府官员们能有一本百科全书式的城市专著,而且也能让各市长对自己的城市有个动态的了解,并使我们的市长们在考虑城市的宏图大业时能多一个思考的角度。本报告是作为非政府第三方,也就是民间机构做出的年度城市报告,它不代表官方立场,也不代表本协会的观点,它的特点是学术性、客观性、前瞻性和包容性。市长协会主办这份报告,完全是为了体现其为城市服务的根本宗旨。以牛文元教授为首的编辑委员会以扎实严谨的科学态度,翔实浩瀚的素材,艰苦卓越的劳动,再次给予了中国城市一份厚重的精神产品,我们向他以及参与该报告撰写的其他科学家致以敬意和谢意!

为了完成中央领导同志的重托,发挥好纽带、桥梁、基地和论坛的功能,中国市长协会必将继续将本报告办下去,而且要越办越好,最终让它成为在中国有独特价值的一份城市报告!

第一本城市发展报告,即2001~2002年度白皮书,在去年年底发行后,受到广泛关注,给予了我们极大的鼓励。希望第二本也能得到社会的认可,得到市长们的喜爱,并提出诚恳的意见,那就是我们最大的满足了!

导 言

中国城市化战略的跃升 ——组团式城市群是新一轮财富集聚的战略平台

《中国城市发展报告》首席科学家 牛文元

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本世纪头 20 年我国将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这对加速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城市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了解我国城市化 50 年的状况,明确推进我国城市化进程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借鉴国际上一些发达国家在城市发展中的经验,探索新时期中国城市化战略形态的转变和发展动力的提升,以及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中国城市体系,寻求引领国家财富台阶式增长的制高点,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的重任具有历史意义。为此,《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02~2003)》提出在中国大力培育具有世界级的三大组团式经济体,将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革命性跃升。

中国城市化在新一轮经济增长战略机遇期的总任务和发展总方向的选择,必须回答七个严肃的问题:

1. 如何真正落实“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指导方针?
2. 是否城市发展方向仍然依照传统式的单极扩大?
3. 如何改变城乡分离、城际分离、地方保护、恶性竞争的弊病?
4. 如何打破产业布局趋同、到处小而全的重复性浪费?
5. 如何消除日益严重的“城市病”?
6. 如何扩大城市就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7. 怎样实现以“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为总体目标的区域一体化?

以上七大问题的统一解决,只有通过城市化发展战略形态的革命性变革,即由原先的单极式城市扩张,转变为组团式城市群的培育,一举克服传统城市化进程中的弊病,真正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获取高额发展红利、降低发展总成本、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等,才能达到社会公平的经济社

会可持续发展目标。

中国城市化状况

21 世纪是城市的世纪,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未来 20 年中国城市化进程将对全球发展产生深刻影响。许多国外学者都把“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并列为影响 21 世纪人类发展进程的两大关键因素。统计数字表明,随着时代的前进和发展,城市化程度的明显加速是一个重大标志,其增长过程与财富积累呈非线性的对应关系。

中国从建国开始的发展战略中就有“积极推进工业化,相对抑制城市化”的主导思想,加上长期“恐城症”的制约,中国城市化 50 年的变迁,一直没能走出一条适合中国特色的道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迅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的速度达到同期世界城市化进程速度的两倍,但是,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城市化程度仍然十分落后。根据世界银行统计,在 1995 年,世界高收入国家城市化率平均为 75%,中等收入国家为 60%,低收入国家为 28%,而中国城市化率还不到 30%。至 2000 年年底,中国城市化率比世界平均低 12 个百分点,比世界发达国家平均低 40 个百分点。虽然从 1949 年全国建市 132 个增长至目前近 600 多个,但随着人口总量的增加,城市人口的比例仍然过于偏小。

中国城市化发展水平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工业化发展水平这种局面,已经成为严重制约我国综合实力提高与国家竞争力增强的“巨大瓶颈”。未来 20 年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时期,大力推进中国的城市化,尤其是寻求城市化战略的进一步提升,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要求,又是有效解除中国经济社会约束“瓶颈”,保障中国经济社会快速、持续和健康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

中国城市化面临严峻挑战

为了支撑中国未来实现现代化的总体进程,从现在起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城市化率将从现在的 37% 提高到 75% 左右。这就意味着只有每年平均增加约 1% 左右的城市化率(即每年约 1000 万至 1200 万人口从乡村转移到城市),才能满足现代化进程的总体要求。在急剧推进的中国城市化过程中,以下的挑战我们必须面对:

1. 城市人口三大高峰(人口总量、劳动就业人口总量、老龄人口总量)相继来临;
2. 城市对能源和资源的超常规利用;

3. 加速城市生态环境“倒 U 型曲线”向右侧变化的良性逆转;
4. 提高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速度和质量;
5. 加速克服“三农问题”实现城乡之间的共同富裕;
6. 城市信息化进程的急速推进与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实现;
7. 城市国际竞争力的提高。

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的“三农”问题,一直是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社会公平、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核心问题之一。虽然国家投入了巨大的力量,从政策到资金,对解决“三农”问题取得了实质性的成就,但是就其整体性解决的目标而言,目前仍有很大的距离。

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到底在哪里?我们认为,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大量减少农民的数量。而大量减少农民的数量,大量吸纳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惟有靠实现城市化战略、提高人口的素质和技能、大力创造就业机会才能够最终完成。只有当农村人口数量下降到总人口的 25% 以下时,农村土地的价值才能达到市场化要求的成本阈值,此时农业土地的集约化生产、规模化生产和专业化生产才能达到一定的水平,农业的科技含量、服务水平和农业成本才会有大幅度的改善,农民的收入水平和整体素质才会有明显的进步,至此,中国“三农”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才能得以彻底解决。

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是中国城市化战略的核心,构筑开放、流动、有序、互补的中国城市体系,是解决中国“大城市能力不大、中城市经济不活、小城市实力不强、小城镇总体不优”的根本战略举措,由此才能真正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中国城市化要走出三大误区

中国城市化战略的健康实施,必须走出认识上的三大“误区”:

误区之一:认为城市的发展必然引发“城市病”。必须建立以发展克服“城市病”、以规划减少“城市病”、以管理医治“城市病”的全新观念。

误区之二:认为必须严格控制大城市的发展。不同规模的城市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城市规模结构是一个具有等级、共生、互补、高效和严格“生态位”的开放系统,大、中、小城市都应当在统一规范下得到合理的发展,组团式城市群的形成与完善是达到这一要求的正确选择。

误区之三:认为城市化的结果应当是均衡分布、遍地开花。必须考虑

到自然基础的差异、地理区位的差异、发展阶段的差异和生态条件的差异对于城市格局与结构的影响。应充分认识到城市宏观布局在三维模型中(时间、空间、速度)必然是非均衡的、非对称的和非线性的。必须认识“以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不均衡,换取社会公平程度实现的相对均衡”这个基本原则。

应进一步加快城市化进程

城市是现代文明的标志,是经济、政治、科技、文化、教育的中心,集中体现了国家的综合国力、政府管理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列茨认为,新世纪对于中国有三大挑战,居于首位的就是中国的城市化,他提出“中国的城市化将是区域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并产生最重要的经济利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署长指出:“城市的成功就是国家的成功”。

世界银行认为:国家的GDP达到1万亿美元是一个标志性台阶,意味着财富积累将步入新的航道。与国际已有的经历相对照:美国的GDP总量在1970年达到1万亿美元,在10年后的1980年,GDP总量达到2.7万亿美元;日本的GDP总量在1978年达到了1万亿美元,在其后的10年中GDP总量达到2.4万亿美元;中国的GDP总量在2000年达到了1万亿美元,依照国家规划在其后的10年(即2010年)预计GDP再增加1万亿美元。为什么美国用了10年的时间使得GDP增长了1.7万亿美元,日本增长了1.4万亿美元,中国分别比他们少增长0.7万亿和0.4万亿美元,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注意到美国当时的城市化率达到87%,日本的城市化率超过65%,而中国在2000年的城市化率仅为36%时,也许可以更深一层地认识到城市化率的不同所导致的社会财富集聚能力的差异。因此,在21世纪的头20年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进程,加快中国的城市化步伐是发挥城市中心作用、提高经济效率的必由之路,也是消除二元结构、实现社会公平的必由之路。中国城市化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成为激发新一轮财富充分涌流的载体。

中国三大组团式城市群

组团式城市群是大中小城市“结构有序、功能互补、整体优化、共建共享”的镶嵌体系,体现出以城乡互动、区域一体为特征的城市发展的高级演替形态。在水平尺度上是不同规模、不同类型、不同结构之间相互联系

的城市平面集群,在垂直尺度上是不同等级、不同分工、不同功能之间相互补充的城市立体网络,二者之间的交互作用使得规模效应、集聚效应、辐射效应和联动效应达到最大化,从而分享尽可能高的“发展红利”,完整实现“区域发展动力、区域发展质量和区域发展公平”三者在内涵上的统一。

城市发展的轨迹告诉我们,其空间形态的演进,具有明显的特征:

城市的点状表征:零维模式(传统城市中心,强调集聚性,产生“城市病”)

城市的线状表征:一维模式(沿江沿路城市带,强调通达性,腹地相对狭小)

城市的面状表征:二维模式(城市群,强调结构性,功能相对不对称)

城市的体状表征:三维模式(组团式城市群,强调等级、有序、互补和立体网络性,最大限度获取“发展红利”)

而大力培育组团式城市群,既是中国城市化战略进程的跃升,也是中国新一轮财富涌流的本质载体。

今后中国必须坚持发展三大具有世界竞争力的组团式大城市集群,打造中国城市化建设中的主力与经济增长能力的“航母”。国家三大组团式城市群必然是大、中、小城市“结构有序、功能互补、整体优化、共建共享”的城市体系,以寻求资源利用的空间最大“整合交集”为根本出发点,让发展红利得到充分涌流。

组团式城市群发展模式的战略突破:

1. 避免了城市摊大饼式的单极化扩张;
2. 形成了以大中小城市相协调为特征的区域镶嵌体系;
3. 建立了以地缘经济为基础的城市空间布局与城际战略联盟;
4. 构筑了以产业链为核心的城市等级系列集合;
5. 实现了效率最大化的城市结构在区域中的逻辑充填;
6. 充分协调了自然—社会—经济的城乡时空耦合;
7. 体现了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优良的文明典范。

用组团式城市群代替单一城市扩张:经济上可以取得台阶式的提升;社会上可加速消除二元结构;生态上可缓解城市的热岛效应;文化上便于多样性的充分交融;系统上形成等级有序的效率体系。

一个充分密集的磁盘,从高达100米的高空摔下时,它破裂后的大小碎片,构成了疏密不等的空间,以此比喻将单极城市“松绑”成组团式城市群,根本原因是以其“表面能”的增大克服了过分密集所带来的“城市病”。从一个局部来看,它的确扩大了对于土地的占用,但如果它的经济贡献率和城乡一体化的程度相对提高了几个数量级,实际上在全国范围内却节省了更多的土地,大大解除了其他地区的发展压力,大大加速了全